

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 / 朱立元主编

Allegories
of
Reading

阅读的寓言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

Paul de Man

[美] 保尔·德·曼 著

沈勇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阅读的寓言

——卢梭、尼采、里尔克和
普鲁斯特的比喻语言

[美] 保尔·德·曼 著

沈 勇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的寓言 / (美) 曼 (Man.P.D.) 著; 沈勇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01-05177-2

I. 阅... II. ①曼...②沈... III. 修辞学—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19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6-15

Allegories of Reading

Copyright © 1979 by Yale University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 价: 30.00 元

阅读过快或过慢,即一无所知。

帕斯卡^①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译注

总 序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在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直接影响下,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为代表的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人们戏称为“耶鲁‘四人帮’”。这四位学者出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把解构主义思想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刮起了一阵解构主义旋风,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这套“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评译丛”精选了四位学者的代表作:德·曼的《阅读的寓言》(沈勇译)、米勒的《小说与重复》(王宏图译)、布鲁姆的《误读图示》(朱立元等译)和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现翻译、推介给读者。

《阅读的寓言》是耶鲁学派的领头人物德·曼的一部代表作。它提出了其独特的修辞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从而深化、发展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误读图示》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也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该书中,作者吸收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所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他并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文学史(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史)的影响研究上,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独创性结论。

《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作者J.希利斯·米勒至今仍是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本书对英国文学史上的七部重要小说作了详尽的解构主义分析和阐释，它抓住各部作品中重复现象不同的运作方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并着力探索“意义怎样从读者与页面上这些词语的交接中衍生而出”，为人们理解这些作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意义空间。

哈特曼的《荒野中的批评》也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结合作品分析强调指出，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因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这也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所以它反复强调批评也就是文学。它还认为，批评需要读者，读者既是作品的解释者，又是作品的创造者。

以上四部著作既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代表作，又有力地推动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德里达的去世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的消亡。现在作为理论思潮的解构主义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它的理论思路、独特视角和研究方法等已经深深地扎根并融入当代各种学术、文化思潮之中，正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耶鲁‘四人帮’”作为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接受和传播者，特别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功地应用、阐释、发展了解构主义理论，并加以推广和传播，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部分著作已经译介到我国，可惜以上四部著作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译本，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酝酿翻译这四部著作，并于1991年就已经完成了翻译。后又几易其稿，多次修改、整理，近期终于付梓。当然，由于是译本，就有一个联系版权的问题。这方面，除了岳勇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外，我的好友、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美国宾州克雷瑞恩大学英语系主任徐乔奇教授自始至终给予了直接、全力的帮助。徐乔奇教授花

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与哈佛、耶鲁、牛津三家出版社联系版权交易事宜,中间又有几度波折,他都设法解决。仅为此事,他就给我发了数十封电子邮件,打了好几次国际长途。这套书能够及时解决版权问题,乔奇教授功不可没。在此,我代表几位译者,首先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岳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圆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梦;同时,也向夏康达教授、徐乔奇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帮助我们联系了国内外的有关出版社。此外,我的师弟、南开大学陆扬教授慨然允诺帮助我们校订一遍,改正其中的不当之处,这真使我们非常感激。

这套译丛虽然出版得晚了一些,但是相信其中许多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希望它们对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仍会有所启示。

朱立元

003

序 言

《阅读的寓言》从历史的研究出发,以阅读的理论结束。为了对浪漫主义进行历史的思考,我曾认真地阅读卢梭的作品。我发现自己无法克服解释狭隘的困难。为了努力克服这一点,我不得不从历史的界限转向阅读的总问题。标志着我这一代人的特征的这个转变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这个转变在原则上可能导致阅读的修辞学超越文学史的规范原则,不过,在本书中,这些规范、原则依然是这一转变的出发点。虽然构成卢梭的主题多样性、里尔克和尼采的年代学、普鲁斯特的修辞学基础的原则由于阅读而受到触动,但是这个批评的结果仍然有赖于这些原则的最初地位。批评能否采取进一步的超越这个解释学模式的措施,不应当预定地或天真地被认为理所当然。

在论述卢梭的第二部分中,我尝试运用持续论辩的方式,详尽阐述和分解各种修辞手法的转换系统。第一部分以较零碎的方法建立了类似的模式,我没有单单分析一个作家,而是分析几个作家。选择普鲁斯特和里尔克作为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语气明显带有感情成分,表述又深刻,使他们特别不同于不再完全是主题性的阅读。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如果连他们的著作都服膺这个修辞学计划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对修辞策略富有敏锐鉴别力的作家来说,上述情况必定是确实确实的。

这个修辞学计划所形成的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修辞学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修辞手法和说服力相互缠夹,或者这两者根本不具有同一性——只是认知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相互缠夹罢了。

我们既不能轻而易举地阐明这个结论所含的意思，也不能概要地表述它们，把它们同具体阅读的错综复杂性分开。然而，反对这个研究方法的人们更热衷于攻击他们所假设的这个方法的意识形态动机，而不是这个方法实行过程中的技术。对于已迅速地成为一个标签和批评对象的“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术语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解构”成为争论的原因以前撰写的，因而这个术语在这里是在技术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争论的意义上使用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术语因此而成为不偏不倚的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天真无邪的。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删除这个术语。其他任何词都不能如此言简意赅地表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肯定地或否定地评价这个术语所暗示的必然发生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当用纯粹否定的术语描述同一个过程时，某些东西便被毁灭了。正如当尼采谈到概念结构的毁灭（Zertrümmerung）或帕斯卡谈到一个信念的毁灭（démolition）时，概念结构或信念本身早已毁灭了。第一次读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书，我便与“解构”不期而遇。这意味着“解构”同我不主张自然也不希望消除的发明的严密性力量有关系。正如人们曾轻易地预言的那样，“解构”已经受到相当大的曲解，人们或者将它摒弃为一种无伤大雅的学术游戏。或者把它斥责为一件恐怖主义者的武器，因而我对反击这些反常现象的可能性愈加不抱幻想，因为这种期望不利于我自己的阅读活动。

撰写《阅读的寓言》花费了长久的时间，而我要感谢的机构名单甚至更长。1969年受哥根海姆研究员基金的惠助，我开始撰写有关卢梭和尼采的论文；在1972—1973年离开耶鲁大学的一年中，借助耶鲁高级研究员基金，我撰写了本书的主要部分，耶鲁高级研究员基金是由梅里特基金会和美国学会委员会拨款增补的；1978年借助耶鲁格里斯沃尔德基金的旅行基金，我完成了最后的审定。我要向许多帮助我取得这个资助的同事们致以谢意；至于我智力上所得到的帮助，我的确感到不胜枚

举。在如此多的事情中,我竟至分不清哪些是他们的影响,哪些是他们的友谊。

本书的各个部分以前已经出版。论述普鲁斯特的部分原来是《乔治·普莱(George Poulet)纪念文集》(巴黎:约塞柯蒂,1972年)中的一篇稿子,题为《最初的变动》。里尔克的一章是为里尔克诗集的法文版撰写的引言(巴黎:初版,1972年)。其他几章曾完整地或部分地刊登在《批评探索》、《发音符号》、《乔治亚评论》、《雕像》、《浪漫主义研究》和《耶鲁法文研究》上。应允重版,谨致谢意。两篇原来用法文写的论文由我自己翻译。

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埃伦·格雷厄姆和希拉·赫德尔斯顿,他们迅速而细致有效地校订了稿子,可靠地清除了定稿中我的所有错误。

除了在其他地方指明之外,所有的法文和德文引文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保尔·德·曼

1979年4月于纽黑文

目 录

001/第一部分 修辞学

003/第一章 符号学和修辞学

022/第二章 修辞手段(里尔克)

062/第三章 阅读(普鲁斯特)

084/第四章 发生和系统(尼采)

109/第五章 修辞手段的修辞学(尼采)

126/第六章 说服的修辞学(尼采)

141/第二部分 卢梭

143/第七章 隐喻(第二论文)

169/第八章 自我(皮格马利翁)

200/第九章 寓言(朱丽叶)

235/第十章 阅读的寓言(信仰自白)

263/第十一章 允诺(《社会契约论》)

296/第十二章 辩解(《忏悔录》)

320/索引

第一部分 修辞学

第一章 符号学和修辞学

根据最近出版的各种著作判断，时代精神正朝着形式主义和内在批评的方向发展。我们也许再也不会听到许多关于关联（relevance）的论述，但是我们继续听到许多关于指称（reference）的论述，关于语言所涉及的非词语的“外部”（outside）的论述，语言正是受这个“外部”限制并依据它发挥作用的。重点不全在于文学的虚构状况——一个目前也许有点太易于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性质——而在于这些虚构和一些据说是具有现实意味的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自我、人类、社会、“艺术家、他的文化和人类社会”这些范畴具有现实的意味。因此，杂文所考虑的重点部分是文学上的，部分是指称的；通俗小说的重点是蓄意地达到社会和心理的满足；文学自传的重点是作为理解自我的钥匙，等等。我们似乎是在说，由于文学形式的问题曾经并永远得到了解决，由于结构分析的技术日臻完美，我们现在能够把“超越形式主义”（beyond formalism）引向一些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并最终收获在苦心孤诣地技术钻研下的成果。这些技术为我们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做出了准备。由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秩序得到了妥善的控制，我们现在可以信心百倍地致力于文学的外交事务、外部政治了。我们不仅感到有能力这么做，而且我们采取这个步骤得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的道德意识不允许我们做旁的事情。我们坚信有可能达成可信的阐释，

近年更倾向于视写作和阅读为潜在的、有力的公共言语行为,在这信念和倾向之后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必然,重在努力协调文学语言内在的、形式的和人的结构及其外在的、指涉的和公共的效果。

现在,我想把这个倾向本身概要地看作一个不可辩驳的和经常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不考虑它的正确和错误或它的合乎需要的价值或有害的价值。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文学研究中时有发生。一方面,文学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其指称意义可以被完全破译出来的明确的单位被人们接受。代码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复杂的和莫测高深的;它吸引了对它自身的过分的注意力,于是这个注意力不得不去获得方法的严密性。为了代码本身的缘故而专注于代码的结构要素是在所难免的,因而文学必然产生它自己的形式主义。文学方法研究中的技术革新唯有在这个注意力占据统治地位时才会发生。例如从技术的观点看,自从新批评的革新著作问世以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于美国的批评中。当然,自那时以来,已经有许多杰出的批评著作问世,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部使描述和解释的技术超越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细读技术。形式主义似乎是一个十分诱人而专制的缪斯;文学批评史并没有产生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技术的独创和推理的雄辩的希望。

另一方面,——这是真正神秘的——不管文学形式主义的分析能力如何精确和丰富,如果没有表面上的分解,文学形式主义永远不会被允许产生。当形式被当作文学意义或内容的外部标志时,形式似乎是表面的可以弃之不顾的东西。20世纪内在的、形式主义的批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个模式:形式现在是一个唯我论的自我反射的范畴,而指称意义被当作是外在性的。虽然内部和外部的性质已被颠倒过来,但它们仍然是同样的起作用的极性:内在意义变成了外部指称,而外部形式变成了内在结构。一个新的分解形式立刻随着这个颠倒产生:人们现在通常用监禁和幽闭等恐怖的形象化描述来描绘形式主义:“语言的牢房”,

“形式主义批评的死胡同”，等等。同普鲁斯特小说中的祖母不断地把年轻的马赛尔赶出屋子，进入花园，从而去除他幽居小室阅读的不良内在性一样，批评家们在大声疾呼指称意义的新鲜空气。由于代码结构非常晦涩，而意义又如此急于消除形式的障碍，因而难怪形式和意义的和谐会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和谐的吸引力是错误模式和隐喻的有选择的滋生地；它把文学的隐喻模式解释为一种内部与外界相隔绝的盒子，读者或批评家便是将盒盖打开的人，以向外部释放里面密而不宣的东西。我们是将这个盒子的内部叫做内容还是形式，将盒子的外部叫做意蕴或外表这无关紧要。经常发生的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相对立的争论处于从未被认真地探究的内部／外部隐喻的庇护之下。

隐喻比事实更坚韧，因而我当然不期望在一篇短文中取消这一古老的模式。我仅仅希望思考一套不同的术语，与内部和外部间的性质截然相反的、二元的对立相比，也许这套不同的术语在差别的关系方面较为复杂一些，因此进入不费力气交叉颠倒的游戏的可能性也较少一些。我注重实际地从对最近批评方法论方面的进展和争论的观察中引出这些术语（这些术语如同山丘一般古老）。

这当中，一个最引人争议的进展与诗学研究的新动向相吻合。它在德国，作为一个普通符号学分支，被称为诗人学。在法国，文学符号学是作为源远流长、但又更为激烈敏锐的法国文学精神同形式范畴相冲突的结果而产生的。与语义学不同，符号学是关于能指（signifiers）的符号的科学或研究；它不是询问一些词的意思，而是询问这些词是怎样表达意思的。不像美国新批评从高度自觉的现代作家的实践中推导出形式的内在化、法国符号学求助于语义学来建立它的模式，把索绪尔和雅各布森（Jakobson）而不是把瓦莱里（Valéry）或普鲁斯特^①尊为它的大师。

^① 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者。雅各布森（1896—1982），俄裔美国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意识流小说作者。——译注

006

由于意识到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意识到文学是一个本身具有目的、“集中于被表达的方式”（雅各布森）的陈述，整个问题就可以被放在括号内，从而使批评的话语免除了释义的沉重负担。在法国历史和主题批评的发展脉络中，符号学的消除神秘化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它表明，如果人们不加批判地屈从指称的权力，那么对语言的文学方面的知觉就会变得极其的模糊。它还揭示出，这个指称权力怎样继续顽固地坚持以各种各样的从最粗糙的意识形态到最精致的审美和伦理判断的形式伪饰，来表明自己。它尤其破除了符号和指称的语义一致的神话，粉碎了从两方面拥有这个神话的愿望，即在早晨作为一个形式主义批评家、在下午作为一个社会道德家来解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既为形式的技术又为意蕴的主旨效力。法国批评的实践成果如同它们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一样硕果累累。也许自18世纪晚期以来，法国批评家们第一次能够至少有点较为接近获得这种语言学意识。这种语言学意识过去曾永不停顿地在法国诗人和小说家中发挥作用，并迫使他们，包括圣·佩韦在内，去撰写他们的主要著作——《接近圣·佩韦》。英国和美国的距离过去从未如此之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国家我们也许有能力完全不需要某种作预防之用的符号学自卫术。

今天，法国和其他地方的实践的文学符号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语法（尤其是句法）结构和修辞结构的联合使用，人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在使语法和修辞功能保持完美的连贯性，并使语法结构毫无困难或障碍地过渡到修辞结构方面，巴特（Barthes）^①、热奈特（Genette）^②、托多罗夫（Todorov）^③、格雷玛斯（Greimas）^④和他们的追随者们的文学分析都不免简单化，从而倒退到

① 巴特（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符号学家。

② 热奈特（1930—），法国文学批评家。

③ 托多罗夫（1939—），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

④ 格雷玛斯（1917—1992），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语义学研究者。——译注